

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报告

“十三五”时期 中国文化发展环境和 重大问题研究

STUDY ON THE ENVIRONMENT
OF CULTURE DEVELOPMENT
AND POSSIBLE CHALLENGES
IN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张晓明 李河 章建刚 等/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三五”时期中国文化发展环境和重大问题研究/张晓明
等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 - 7 - 5097 - 8396 - 2

I. ①十… II. ①张… III. ①文化发展 - 研究 - 中国 -
2016 ~ 2020 IV. ①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8936 号

“十三五”时期中国文化发展环境和重大问题研究

著 者 / 张晓明 李 河 章建刚 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恽 薇

责任编辑 / 于 飞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济与管理出版分社 (010) 5936722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3 字 数: 49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8396 - 2

定 价 / 30.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多位学者配合国家“十三五”规划的制定，就国家实施“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进行了多项专题研究，包括《“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趋势和思路》《“十三五”及2030年发展目标与战略研究》《“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及对策》《“十三五”时期老龄化形势与对策》《“十三五”时期促进服务业发展改革研究》《步入“十三五”的财税改革》《“十三五”时期劳动力市场转型对策研究》《“十三五”时期工业转型升级的方向与政策》《“十三五”时期国有企业改革重点思路》《“十三五”时期城镇化和区域发展战略研究》《“十三五”时期资源环境发展战略研究》《“十三五”时期收入分配问题及对策研究》《“十三五”时期中国文化发展环境和重大问题研究》。

这些报告是国家级智库深度剖析“十三五”规划、参透中国未来发展大势的精品著作，深入分析了未来五年以及更长时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趋势和问题，提出了未来发展的思路 and 对策，对于我们理解我国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面对的新形势、新情况、新挑战、新趋势，对于我们思考我国在经济新常态下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路径选择，对于我们深刻领会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的精神和战略部署，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



摘 要

本文认为，“十三五”时期我国将进入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为了适应中国成为全球性国家的新形势，为因应国内外环境出现的重大变化，必须大力推进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以突破文化发展的社会建设瓶颈，必须对一系列制约国内文化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根本性的解决方案。

目 录

引言	“十三五”时期：为“两个 100 年”做好文化准备的 关键时期	/ 001
一	“十三五”文化发展环境的历史定位	/ 003
二	“十三五”时期我国文化发展的国际环境	/ 006
三	“十三五”时期我国文化发展的国内环境	/ 014
四	“十三五”时期我国文化发展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 022

引言 “十三五”时期：为“两个100年”做好文化准备的关键时期

（一）“十三五”文化发展的基本主题：如何为“两个100年”做好文化准备

“十三五”时期（2016~2020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前的最后五年，这期间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五·四新文化运动”100周年等重大纪念日。“十三五”时期也是我国经济深化改革，“经济新常态”全面显现的时期，是我国全面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关键时期。“十三五”时期还是我国实际经济总量接近乃至最终超越美国从而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时期，它标志着中国开始成为新的全球性国家，由此将会引发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的新变动。总之，“十三五”时期将是中国在一系列重要政治、经济、社会指标上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是“中国梦”从梦想变为现实的关键时期。

然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能缺少文化内涵和文化发展目标。国内文化繁荣和对外文化影响力强劲，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而且是这一复兴应该追求的最高目标——即中国应向世界贡献一种“文明的典范”或“典范的文明”，中国应再度成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从这一目标来看，文化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日益具有全面引领、境界提升的作用。“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的基本主题是如何为“两个100年”做好文化准备。

（二）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问题：如何解决改革“半途之难”，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文化制度开辟道路

回顾十五届五中全会以来的发展历程，我国文化发展经历了“十五”期间文化体制改革从试点到全面铺开，“十一五”期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来袭

而将文化产业推上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同时文化体制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完成阶段性任务，以及进入“十二五”时期以后文化产业发展方式开始转型，文化体制改革进入“间歇期”的过程。

十八大以来，对于文化体制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说法不绝于耳，但是，如何将十八大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指导思想贯彻到文化领域，“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仍缺乏进一步的思路和实质性的进展。关于进行“顶层设计”的呼声尽管一浪高过一浪，但是缺乏共识以及深入制度层面的改革创新。文化体制改革进入了“间歇期”，甚至是“半衰期”。

文化体制改革不能永远“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如何深化改革涉及真正的“顶层设计”，但是如果对于改革目标没有清晰的认识，就没有不是出于策略考虑的顶层设计。正如经济体制改革那样，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也需要突破利益集团的阻力，才能继续前进。

（三）当前面临的转折：走向文化发展的“新常态”，需要制定国际文化发展战略和建立文化治理体系

“十三五”时期，也是当今世界文化与科技融合，文化与经济汇流，文化创意产业飞速发展，文化贸易规模快速扩大的重要时期。在国内，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要起决定性作用，强调要建设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各级部门的治理能力。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经济新常态”，将经济结构转型和政府简政放权放到一个更加明确的战略地位。而在对外领域，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对外经济和政治战略日益清晰，告别“韬光养晦”的对外政策模糊期，将“经济走出去”提法具体落实为“一带一路”等重大对外战略举措，快速有序地在周边地区、欧亚大陆、非洲拉美地区完成全球性经济和政治战略布局。

“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的总主题是“新常态”，文化发展也应有“新常态”。相比较经济领域而言，文化领域发展更为滞后，因此文化发展的“新常态”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必将伴随全面的改革。总体看来，“十三五”时期中国文化发展将会凸显两大主题：在国内，“十三五”时期的第一主题词是建立健全“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即将文化市场建设、文化产业发展、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以及相关文化体制改革，一并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建

设,按照依法治国原则,全面构建文化治理体系,提高从中央到基层的文化治理能力。在国际,“十三五”时期的第一主题词是全面构建“中国对外文化发展战略”,以适应中国成为全球性国家的现实,为“一带一路”等对外经济和政治重大举措提供持久的文化软支撑。为此,应探索以法律为基础、以政策为引导、以文化产业为骨干、以全面构建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为支撑的中华文化走出去模式。

一 “十三五”文化发展环境的历史定位

中国的现代化是“外源性”的,因此国内发展环境可以看作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但是也不能将全球化单纯地理解为外部环境,我们就是全球化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不仅是融入全球化,而且势必会在其中发挥越来越重大的作用。换句话说,中国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自己营造的。

(一) 全球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殖民主义、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

全球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表现为殖民主义,而它的结果是激起殖民地国家的反抗。“二战”后这一阶段被全球民族独立运动所终结。但是殖民主义也留下了全球市场网络,全球化进入被称为“经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尽管经济全球化也被诟病为“新殖民主义”,但全球市场体系仍然在不断发育中。随着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全球市场的公平和竞争都在增加,而第一阶段结束后遗留的“冷战”局面也基本被消除。随着科技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后兴起的知识与创意经济正在将全球化带入全球化第三个阶段,经济全球化正在向文化全球化迈进。在这个新阶段,国家间的发展竞争最终拼的是文化,“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冲突也转化为“文化冲突”。美国已经打造了一个可以“在本土与全球之间双向运行的文化体制”(马特语,见《论美国的文化——在本土与全球之间双向运行的文化体制》);保护与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则成为包括欧洲各国在内的新的全球趋势。全球化的态势不仅不主要表现为有形的物质产品的竞争,而是表现为价值观和文化影响力之间的竞争。

（二）中国的发展是在全球化格局中发生的，目前正处在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迈向第三阶段的转折期，理解国内外的发展环境必须从此着手

迄今为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应对全球化挑战的过程中实现的。在全球化第一阶段末期，中国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民族国家；在全球化第二阶段的末期，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重量级选手和规则制定的参与者，并正在走向继美国之后又一个具有“全球利益”的大国；而在全球化第三阶段，做大自己的文化产业，并因此取得在全球的话语权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是中国人民最大的发展趋势认同，“文化强国”是中国人民共同认可的“两个100年”战略目标。

从全球化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折是“十三五”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定位。这一历史定位决定了当前中国文化发展环境的种种特点与矛盾。我们的国家携带着全球化第一阶段的历史遗产，奋力登上了全球化第二阶段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10多年来又开始拥抱知识经济和文化产业，希望在综合国力竞争的新阶段迎头赶上，占据有利地位。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全球化第一阶段结束时我们选择的“计划经济”发展路径和体制，在全球化第二阶段的国际竞争中演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混合体制，但是在走向工业化最后阶段的时候遭遇“发展方式转型”困境和“中等收入陷阱”挑战，而在面对全球化第三阶段挑战时显示出明显地滞后于（文化全球化）发展的需要。

目前我国的发展所处的历史地位应该这样被理解：我们正处在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迈向第三阶段的转折期，在全球范围内新兴工业化正在与文化创意产业合流，产业结构正在迅速调整；在国内工业化尚未完成，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原则在经济领域刚刚确立，在文化领域建立健全现代市场体系的改革刚刚破题，以宪法和法律为基础的体制建设尚在探索之中，不得不依赖于出台各种临时性的政策打通市场通道和弥补制度性的缺陷。改革和发展依然是我们面临的双重任务。

（三）中国下一步的发展必须参与新一轮全球化的构建

自从2001年我国加入WTO，国际竞争规则就开始倒逼国内改革，随着中国国际经济影响力的增长，中国与全球化的关系也将从被动接受规则到积极参与规则的制定，因此从“十三五”时期开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如何参与新一轮全球化的构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以及要理顺内宣外宣体制，支持重点媒体面向国内国际发展，这就把参与新一轮全球化构建的任务正式提了出来。

参与新一轮全球化构建的关键是参与全球普世价值构建，这是参与全球化规则制定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如以上指出的，在全球化第一阶段结束时我们走上了计划经济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为针对具体国情谋发展，以及应对激烈的国际政治博弈，我国在对内发展道路上坚持中国特色理论，着力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拒斥来自西方的“普世价值”；在对外政策上秉承“韬光养晦”宗旨，在处理国家关系时避免带入意识形态原则。以上战略基本上属于“防御性”战略，在“冷战”结束时曾经令我们避免陷入大国博弈，并进而分享了第二次全球化高峰期全球产业转移的重大红利。但是这一战略显然不能继续指导我们应对全球化第三轮的挑战，某些思维惯性甚至令我们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

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在文化经济大汇流、国内外市场一体化迅速发展的形势下，理顺内宣外宣体制，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是积极应对新一轮全球化的重大举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过度强调我国与他国的文化差异或发展模式的差异，一再申明中国经验既不来自他国，也难以为他国所效仿，而不是积极探索中国加入全球化对于普世价值有何贡献，容易陷入“特色论”与“普世论”二元对立的无谓争论，从方法论上说，是“一点论”的而非“两点论”的；从实践来看，无疑会给中国文化产品和观念的全球流通带来政策障碍，会导致作茧自缚。这样的观点与中国开始走向全球性国家的现实、与中国应该成为“文明型国家”的目标是不匹配的。

因此，要想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国家或“文明型国家”，要想积极参与全

球化构建，就要积极寻求与域外民众共同构建“可分享价值”（Shareable Value）。在某种意义上说，“可分享价值”就是通向新的“普世价值”的道路：“可分享价值”可以形成最广泛的共识，为世界各国以历史资源为依托，通过渠道多样、内容广泛的国际交流而达成新的全球治理框架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这种“可分享价值”的提出可以被视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普世价值”构建，从而成为新一轮全球化主导国家的关键性举措。

二 “十三五”时期我国文化发展的国际环境

观察“十三五”时期国际经济政治态势，必须考虑一个重要事实，即中国正快速崛起为新的全球性国家，由此将在全球经济格局和政治博弈中引发一系列重要后果。中国问题日益具有世界性，世界经济政治态势分析越来越不能绕开中国话题，对此拟从三方面进行说明。

（一）世界经济总体态势和近期走向：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对世界经济总体态势的分析属于时间跨度十数年以上的中长期预测，而对其近期走向的观察则属于跨度三五年的短中期判断。世界经济高度专业复杂，这里不妨选择一种简化分析法，即重点观察世界几大经济体的对比消涨情况。几大经济体概而言之是指：包括美国、欧盟、日本等在内的“西方经济”；中国引领的“新兴经济体”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经济学者有时称之为“南方经济”，有时也称之为“东方的经济”。

1. 中长期判断

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在增速和规模上一直保持“东升西降”的总体态势：即以中国为引领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普遍高于发达国家，其经济规模在世界经济总量的占比日益扩大。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而且正在跃升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其外溢效应使其快速发展成为在全球拥有经济利益的国家。这一观察，可以由以下四个判断来支撑：

判断之一：如果不出意外，中国将在“十三五”时期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规模的一些突破性数据多次引发世界关注：

2010 年中国名义 GDP 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结束了日本 1968 年以来长期居于世界经济第二位的局面。2013 年,中国 GDP 总量超过了欧元区,并超越日本一倍(这固然有日元对美元大幅贬值的因素,但中国、日本经济总量拉开距离也是不争的事实)。2014 年 4 月底,世界银行“国际比较计划”更新了各国基于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 GDP 规模数据,并断言中国将在 2014 年 9 月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①由此引发媒体关于中国实际经济规模的热议。

不少专家认为,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人均 GDP 数据和经济发展的内涵性指标等更具有权威性,而 GDP 总量数据属于媒体炒作话题,不值得认真关注。这种看法失之偏颇,因为目前的国际秩序依然是大国支配型的。在这个背景下,经济规模总量指标当然具有更直观和不可小觑的意义。譬如,就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而言,经济内涵性指标卓越的新加坡远不能与经济总量规模巨大的中国相比,就此可以说,规模就是影响力,规模就是话语权,规模效应是硬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判断之二:发达国家经济总量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日益下降,自 1815 年以来“西方上行,东方下行”的态势正面临历史性转折。其实,中国实际经济规模世界第一,只说明它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还远不是最强的经济体。但是应该看到,这种关注背后隐伏着一个历史性情结:中国将成为 19 世纪 90 年代以来首个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后发型国家,这对当今世界其他后发型新兴经济体将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谈到中国代表的世界新兴经济体的整体影响,我们还看到另一组同样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2013 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首次低于世界经济总量的 50%,而这是自 1815 年以来的第一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二战”结束到 20 世纪 70 年代这个发达国家的巅峰时期,美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一半,发达国家经济总量占全球的 2/3,如今,“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已告结束。

判断之三:如果不出意外,“十三五”时期中国将打破“持续高增长”世界纪录,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实现最长周期的持续高增长,无疑是人类史上的重大事件。除了经济总量比较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事实。这两年

^① 这是自 2005 年以来世界银行对这类数据进行的第一次更新。世界银行的权威评估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大多数公共和私人部门机构采用。

中国经济出现了下行压力,“中国崩溃论”的说法再度兴起,而中国官方近期关于“经济新常态”的提法,似乎也从侧面印证了中国经济发展趋缓已成定局。

然而,虽然面临巨大困难,但应看到,中国尚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化率刚刚超过50%,经济梯次发展空间巨大,再加上诸如土地国有等一系列因素,因此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仍将维持年均7%左右的增速。

7%的增速指标具有某种象征意义。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学者斯彭斯在2007年发表文章提出,一个经济体维持7%的增长达25年以上,即可被定义为“持续高增长”。“二战”以后,包括中国在内全球共有11个这样的持续高增长经济体,其中韩国持续高增长时间最长,达40年;新加坡为37年。^①根据这个标准,中国在1977~2013年时段中,除1984年、1989年和1990年外,已经维持了33年的持续高增长,其平均速度为9.7%。而到“十三五”时期结束,如无重大变故,中国持续高增长将超过40年,成为有史以来高速增长周期最长的经济体。

判断之四:高增长周期较长、正走向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加大。从对世界经济的拉动效应来看,2004~2013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为世界第一。根据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夏季达沃斯”的谈话,2013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30%。也是在2013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4.16亿美元,超过美国的3.91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以世界为巨大市场,同时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巨大市场。

总之,中国持续高增长、实际经济规模世界第一、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大,所有这些都将对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产生重要影响,这些数据对于诠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

2. 短中期判断

尽管世界经济的总体态势从中长期看是“东升西降”,但从短中期来看,近几年国际经济增长格局却经历着“西升东降”的反复,这是指自2013年

^① 刘树成、张晓晶:《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特点与地区间经济差异的缩小》,《经济研究》2007年第10期。

起，发达国家经济开始整体回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新兴经济体面临巨大困难。

在发达国家方面，尽管经济和金融领域中的结构性缺陷依然存在，但近两年来美国与欧元区的经济整体回暖趋势加快。2014年，美国GDP增速将达到近年来的新高，达到2.5%~3.0%，失业人口降到历史新低，金融领域极为活跃，2014年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0年中首次超过中国，重居世界第一。欧元区经济增长虽然依旧困难重重，但也开始由负转正：德国经济快速增长，法国缓慢复苏，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西班牙乃至希腊也陆续脱困，欧元区2014年经济增速为1.2%。此外，英国经济复苏前景较佳，全年经济增速预计将达到2.9%。日本经济依靠政策刺激也出现短期恢复。

与之形成反差的是，近年来不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受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等问题拖累，受地缘政治风险和国内社会动荡的影响，普遍面临外需疲软、内生增长动力不足、通胀压力上升的问题，有的出现能源出口亏损、资本外流和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在这方面，俄罗斯和巴西的经济形势尤为严峻，两国2014年预计增速仅为0.5%和1.3%。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在经历多年高增长后开始减速。国内经济结构不合理，传统企业的国际比较优势逐渐弱化，产业门类多处于国际分工中低端，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竞争压力在迅速增大，所有这些因素都使中国经济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未来几年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金融风险、地缘政治风险和社会动荡等问题不断加剧。

总之，从中长期趋势来看，中国引领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的“东升西降”格局没有改变，即使在新兴经济体普遍面临困境的2014年，新兴经济体平均增速为4.9%，发达国家整体为2.2%。但从短中期来看，目前出现的“西升东降”态势在未来两三年不会有根本改变。而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无疑是“十三五”时期最重大的世界经济事件。

（二）国际政治态势：中国布局全球战略，挑战“一超多极”世界格局

观察近期的国际政治态势，一个最值得关注的亮点在于，正在跃升为世

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中国参与国际政治博弈的姿态日益主动活跃。十八大以后,中国开始走出过去20年以“韬光养晦”为基调的“对外战略模糊期”,全球战略意识日益清晰,在多个全球或区域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快速提升。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密集推出“一带一路”对外经济政治重大举措,快速有序地实现其经济政治全球战略布局。总之,随着从区域性大国走向全球性国家,冷战结束后形成的美国一家独大,欧盟、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区域大国多强竞争的所谓“一超多极”世界格局受到挑战。

1.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或区域经济政治组织,影响力快速增强

毫无疑问,中国在经济层面上具有“全球性国家”的基本特征:它是全球最大的“能源依赖型”国家,全球第一大能源进口国;它凭借近期凸显的资本和制造业技术优势,加快向全球输出资本和制造业技术;等等,显然,中国已成为在全球主要区域拥有重要经济政治利益的国家。

随着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加大,它在亚太经合组织、^①东盟—中国“10+1自贸区”等区域性经济组织中的影响快速提升,在20国集团(G20)、^②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等全球性经济组织中的话语权不断增大。不仅如此,中国在构建新型国际组织方面的能力不断增强,如它积极参与“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集团”(BRICS)、中非合作论坛、中拉合作论坛的设计和建设。

2. 中国主动推出“一带一路”等对外经济政治重大举措

21世纪初,中国首次提出“经济走出去”战略。2014年两会上,中国政府正式对外推出“一带一路”战略,显示其开始告别“韬光养晦”的战略模糊期,全球经济政治战略日益清晰。

丝绸之路经济带:2013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及“丝绸之路经济带”设想,该设想最初针对的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迅速获得相关区域国家的响应。不过,随后一年

① 亚洲太平洋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官方经济合作论坛,共有21个成员(不包括居于南亚—印度洋区域的印度),其人口26亿,占全球人口的40%,GDP总量占全球的56%,贸易额占48%。

② G20是由发达国家的“八国集团”和十二个新兴经济体组成的国际经济合作论坛,其总人口40亿,GDP总量占全球经济的85%,贸易额占80%。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列席会议。它已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

多的发展表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最大辐射范围决不止于中亚地区,它几乎涵盖从中国东部到欧洲西部、南部的整个欧亚大陆。作为该战略的重要载体,欧亚铁路、中俄高铁、中国与南亚高铁规划陆续推出。

海上丝绸之路:比“丝绸之路经济带”略晚,2013年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东盟国家时又提出“海上丝绸之路”战略,随着时间推移,“海上丝绸之路”覆盖范围也逐渐延伸,最终覆盖东亚(日韩)、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北非。

南环经济带:“一带一路”战略是以欧亚大陆及周边区域为主要视点,但中国全球战略的目光并不局限于此。前面提到的中非合作论坛和2015年初举行的首届“中拉合作论坛”,为中国的全球战略勾勒出更广阔的轮廓。2015年1月8日,美国学者奈斯比特推出新书《大变革:南环经济带将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该书从全球经济新格局角度首次提出由中国引领的“南环经济带”将引发世界经济格局大变革。所谓“南环经济带”覆盖亚洲、非洲和拉美,涉及150多个国家,我们可以将该命名视为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补充。

总之,“一带一路”战略和“南环经济带”战略构成了中国全球经济政治战略的基本轮廓,标志中国全球战略意识的觉醒和明确。

3. 中国对外全球战略对美国全球战略布局形成潜在挑战

近期国内外舆论多在谈论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这既不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全部,也会给理解美国全球战略带来误解。

需要说明,在做出“中国正走向全球性国家”时,我们明确意识到,美国才是“冷战”后世界上存在的唯一全球性国家。布热津斯基列出这个“全球性国家”的几大特征,包括:军事方面在全球发挥着无可匹敌的力量;经济方面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技术方面在开创性尖端领域保持全面领先地位;等等。除这些指标外,布热津斯基强调指出,美国的全球战略是以它主导的全球秩序作为依托的,该秩序包括:其一,北约和美日安全条约两大安全体系;其二,地区性经济合作组织(OECD、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专门的全球合作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其三,由美国主导的做出一致决定的程序,以及优先吸收民主国家的各联盟组织;其四,一个初始的全球立宪和司法体系(世界法院、审

判战争罪的特别法庭)。

此外,从全球战略布局看,布热津斯基指出,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欧盟和日韩一直是美国陆权关注的两大战略支撑点;而打造全球海洋力量则是美国这个海权论诞生地国家的一贯追求。

以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为靶向,不难看到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对前者形成的潜在挑战:“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覆盖整个欧亚大陆,将东亚和欧盟纳入其战略关注范围;而“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则剑指广阔的亚太、印度洋海域,对美国的全球海洋战略形成蚕食。

正是为因应中国近期的发展态势,尤其为消解中国在东盟自贸区、亚太经合组织以及世贸组织中日益增强的影响力,美国政府自2013年起强势推进由其主导的两大协定谈判:一个是“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谈判;另一个是与欧盟委员会共同启动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谈判。^① 值得关注的是,这两项谈判的主要战略区域依然是两块:一个是亚太地区,由美国主导的TPP谈判的基本目标是把在亚太经合组织中日益活跃的中国搁置一旁,与跨太平洋这个世界上发展最快地区的主要国家,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东盟主要国家等达成下一代的、高标准的贸易协定;另一个战略区域是欧盟,美国希望通过TTIP谈判与欧盟形成全方位的贸易合作,纠正舆论认为美国重视东亚、忽略欧洲的错觉。

总的说来,随着中国全球经济政治战略的日益明显,美国显示出调整其全球战略体系、巩固其国际秩序主导权的明显意图。

(三) 中国周边态势:周边国家进入摇摆期或抉择期

中国周边国家,包括“冷战”后新独立的中亚主要地区,自古以来属于所谓“中华文明圈”的辐射范围。“二战”以后,东亚、东南亚国家普遍进入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建构进程,“冷战”后独立的中亚国家也在延续这一历史进程。

从具体区域来看,东亚地区的中国与日本韩国在历史上同属“儒家文化

^① 该谈判2013年6月启动,计划两年内完成。